

沈清松 編

中國人的價值觀——人文學觀點



中國人叢書

15



□ 桂冠圖書公司 □

多科際的合作——
當代人文及社會科學家眼中的中國圖像

中國人叢書 15

中國人的價值觀——人文學觀點

沈清松 主編

「中國人叢書」編審委員

(以姓氏筆劃順序排列)

文崇一	——	社會學
李亦園	——	人類學
胡 佛	——	政治學
韋政通	——	思想
張玉法	——	歷史學
郭博文	——	哲學
(召集人) 楊國樞	——	心理學

桂冠圖書公司出版

中國人叢書

中國人的價值觀

——人文學觀點

編 著／沈清松
出 版／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人／賴阿勝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1166號
地 址／臺北市新生南路3段96之4號
電 話／368-1118・367-1118
電 傳／368-1119
郵 撥／01045792
印 刷／海王印刷廠
裝 訂／欣亞裝訂公司
排 版／上統電腦排版公司
初版一刷／1993年6月
再版一刷／1994年8月

本書如有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調換

定 價：新臺幣300元

ISBN 957-551-661-3

各文作者簡介

(按姓名筆劃順序)

- 池田知久 東京大學文學部中國哲學科教授
- 沈清松 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所教授
- 吳光明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University of Wisconsin—Oshkosh
- 林慶彰 中央研究院文哲所籌備處副研究員
- 張亨 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系教授
- 陳永明 香港浸會學院中文系講師
- 傅佩榮 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系教授
- 黃俊傑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
- 劉述先 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 劉思量 國立藝術學院美術系教授
- 蔣年豐 東海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中國人叢書序

整個的中國近代史，可以說是一部中國人在現代世界中變遷圖存的血淚史。一百多年來，各種各樣的中國知識份子，殫精竭慮、焦思苦詣，分採不同的意識型態，各用不同的方法手段，試圖使中國社會富強康樂，以適存於日新月異的現代世界，在中國的土地上，曾經提出過種種思想，發生過種種革命，出現過種種變亂，經歷過種種政治與經濟的實驗。但是時代的巨輪並不因為中國人的坎坷境遇而停止運轉，隨著無休無止的苦難與奮鬥，莫可抗拒的變遷脚步正在各個中國社會不斷地向前邁進。

在世界性的現代化潮流下，社會變遷的歷程正在不同的中國社會以不同速度推進。在三個主要的中國社會中，香港很早就是一個高度工商化的現代都市社會，正在繼續不斷地快速蛻變；台灣原是一個農業社會，經歷了幾十年的現代化社會變遷，現在已是一個基礎堅實的工商社會；大陸上的中國社會的變遷方向雖然不同於台灣與香港，但其變遷的幅度卻不可低估，而且其變遷歷程最近幾年已有轉向的跡象，正在試圖逐漸步上現代化的道路。

在各個中國社會以不同的速度不斷變遷的過程中，有幾項令人憂心的現象發生了。首先，我們發現了一種新的現代化中國社

會已在台灣與香港形成，而在此等新的中國社會裡，一種新的現代化中國人也逐漸出現。但生活在這些中國社會內的中國人，對這種新型的中國社會既缺乏經驗，對這種新型的中國人也毫無瞭解。影響所及，乃使他(她)們在適應新的社會環境與新的人際關係時，易於產生種種新的問題與困難。另一值得注意的現象是在現代化的社會變遷過程中，人們常會形成一種喜新厭舊的價值觀念，不知不覺地認為現代的都是好的，傳統的都是不好的。在這種價值觀念的影響下，大家不僅盲目地接受很多不好的現代事物，更重要的是不必要的拋棄了很多優良的傳統事物。尤有進者，隨著這種一面倒的社會變遷的進展，傳統的事物正在快速喪失，而自行創造的新鮮事物又不易出現；當此之時，整個社會極難保持與創造自己的特點，從而形成一種中國式的現代化社會。也就是說，台灣與香港這兩個快速變遷的社會裡，由於傳統中國特質的喪失與新創中國特質的缺乏，民衆對自己的社會與文化已難形成清晰而堅強的認同。

從社會的長遠發展而言，上述種種情形是不正常的，甚至是不健康的。這些不利的現象雖然是快速社會變遷所難以避免的，但關心社會與文化發展的知識份子，總不能袖手旁觀，任其自然演變。這些令人憂心的社會現象，在台港兩地的中國社會最為明顯，因此這兩個地區的知識份子(特別是研究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的知識份子)在這一方面的責任最為重大。我們希望熱愛自己社會與民衆的知識份子，能各依自己的所學、所思、所慮，共同為匡正與補救社會變遷所造成的前述問題而努力。其中的方法之一是針對現代的或傳統的中國人、中國社會及中國文化的主要問題與特徵著書立說，以增進變遷中的中國人對傳統的與現代的中國人、中國社會及中國文化的認識，進而能更有效地適應自己的新

社會，能保留仍然有用的傳統事物，並進而能對自己社會文化的特質有更清楚的認識。

基於以上的認識，我們特邀集有志於此的朋友，決心編輯《中國人叢書系列》為以上所說的目的，共同努力。更具體地說，我們編著這套叢書的主要目的有三：(一)我們希望這套叢書能促進國人對現代的中國人與中國社會的瞭解，進而有助於中國人適應新的中國社會；(二)我們希望這套叢書能使國人從現代生活的需要來瞭解傳統的中國人、中國社會及中國文化，從而得知何者已經過時，何者仍有功能，以免過早而不必要地拋棄很多良好的傳統事物；(三)我們希望這套叢書能使國人經由對中國人、中國社會及中國文化種種特徵的深入理解，而對自己的人民、社會及文化產生堅強的認同。

為了達到這些目的，收入這一系列的著作必須同時符合以下的條件：

(1)書中的內容是有關現代的或傳統的中國人、中國社會或中國文化。

(2)書中的內容具有廣闊的現實意義，而非瑣細枯燥、鉅釘補註的作品；換言之，所談內容要有助於瞭解中國的人民、民族、社會及歷史，或有助於適應現代中國社會的現代生活。

(3)書中的內容具有相當的學術性，說理述事要有學理的基礎或研究的依據。

(4)書中的內容是原創性的著作，而非資料性或翻譯性的作品。

(5)書中的內容是分章專書，也可以是專題文集(作者可為一人或數人)。

(6)書中行文具有相當的可讀性，高中或大學畢業而非學者專

家者亦能理解書中的要旨。

在編輯這一套叢書系列的過程中，爲了慎重其事，桂冠圖書公司特別邀請社會科學及人文學方面的學者，組成編輯委員會，以爲此一系列選擇最適宜的著作。作爲此一委員會的召集人，本人願在此向各位編輯委員敬致無上的謝意。同時，也要藉此機會感謝桂冠圖書公司的負責人賴阿勝先生對這套叢書的理念的支持。

最後，我們希望透過作者、編者及出版者的共同努力，完成一套由中國學者自己所創作的，真正能反映中國人與中國社會的特點的良好讀物。

楊國樞

一九八七年八月二十五日

序於國立台灣大學心理學系

· 編者序 ·

中國人價值觀的傳承 與重建

如果問我們當代人精神上最大的危機是什麼？可以用一個語詞加以概括，那就是「虛無主義」。一種普遍瀰漫著的生命缺乏值得奉獻的價值的心靈狀態，只有繼續追逐眼前的快樂，尤其在所謂後現代的文化運動當中愈形凸顯。而所謂「後現代」，並不是宣告現代的終結，而是在否定「現代性」的價值，這種否定的運動透過對我們現代人所接受的價值的解構、批判、質疑，甚至否定，而顯示出來。其結果是今天的人類正在走過虛無主義的幽谷，而其中最值得關切的問題，就是「值得生命奉獻的理由」的再發現，和價值的重建與創造。

人類若要走出當前虛無主義的幽谷，一方面固然必須重新挺立自己的主體，然而另一方面也不能封閉於人的主體。正如同海德格（M.Heidegger）所指出來的，主體性的哲學以及以人為中心的近代文化，太過凸顯了人性，就如同尼采（Fr.Nietzsche）所言的，是一種「太過人性的人性」，以致構成了一種封閉的人文主義，使得人類的精神缺乏開放性，在封閉的人文主義壓制之下喘不過氣來，也無法伸展其本有的創造力量。因此，如果要走出當前虛無主義的幽谷，人也必須走出這種封閉的人文主義。人有必要走出封閉的自我，向世界開放，向創造的領

域延伸。

然而，文化的傳統正是我們得以走出封閉的自我的一個重要途徑，所謂的歷史傳統，並不是在過去已經形成的與件，就如同在啓蒙運動的時候理性主義和基要主義所認為的，把傳統視為已經形成的包袱。其實，傳統就是價值的延伸，是意義創造以致縣延無窮的時間之流。我完全同意戛達美（HG Gadamer）所謂「活的傳統」的概念。所有的人都是被其文化的傳統所支持的，如此每一個人才擁有一個意義的視域。透過了解自己的文化傳統，人才能夠返回到其自我中最深沈的部份。文化的傳統不只是我們走出有限的自我的途徑，同時也是達成自覺，探索自我中最寶貴的內心泉源的憑藉。也因此，身為中國人，我們要重新生活於中國人的價值當中，在自我的核心尋回價值創造的泉源，首先就必須回去探索中國人在歷史中發展的價值觀。然而，所有的傳統本身都需要創造性的詮釋，需要隨著時代不斷的重建，而不能故步自封。如果沒有價值的創造，價值就變成死亡，也不再值得為它而活了，也因此價值需要不斷的再詮釋與再重整。

有鑑於此，本書的編撰主要區分為三個部份：一、「古代的根源」，二、「人性與自然」，三、「現代的重建」。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都是針對傳統的源頭，以及其中最核心的論題——「人性與自然」加以探討，重新尋索價值的根源。而「現代的重建」則是兼顧當代甚至後現代的脈絡，探索一個中國人可以接受的價值創造的進路，甚至重建價值體系。

首先，在第一部分「古代的根源」當中，主要是針對傳統中國價值觀的探討。共收羅了黃俊傑教授和吳光明教授合撰的〈古代中國人的價值觀：價值取向的衝突及其解消〉，林慶彰

教授〈從詩經看古人的價值觀〉，陳永明教授〈陶淵明的自然論〉等三篇。

黃俊傑教授和吳光明教授合撰的〈古代中國人的價值觀：價值取向的衝突及其解消〉，主要是探討在春秋戰國五百年間，政治社會結構急速變遷與重組的關鍵時刻，中國人的價值取向所面臨抉擇上的衝突與困境，例如忠孝不能兩全，忠信難以並立，個人生命與國家利益難以兼得……等等。該文進而指出此種價值衝突的根源，可以歸結為「分位原則」與「形式原則」之間的衝突。所謂分位原則，是指人在人際互動關係網絡中，當事者在其分位上的絕對要求；而所謂的形式原則，則是針對行為本身價值的絕對要求。

該文並認為由此兩原則上的衝突，往往形成悲劇的情境，但悲劇具有開放性。悲劇之所以崇高，是因為個人可以透過它體察到真正的自我，而且在悲劇的犧牲中也可以看到生命意義的完全顯豁。換言之，悲劇還是決定於個人的抉擇，在面對形式原則與分位原則的衝突時，個人讓價值困境中的各種衝突納入個人生命之中，並且讓此種衝突性在個人的生命裡引爆，才會產生悲劇。所謂悲劇的開放性，是指悲劇的情境是一種開放性的傷痛，由於其為開放性，所以人可選擇勇敢面對，從容就義，也可選擇逃離困境，以懦夫自處。這是該文在分析古代中國人價值衝突所引起的悲劇性抉擇中所蘊含的現代意義。在此，實際上作者已經加入了現代人對於個人抉擇的重視了。但是，很顯然的，在古代中國人的價值觀當中，個人抉擇的價值並未被提昇到足以解消悲劇的地位。因此，本篇在這一點上可以說賦予了古代中國人價值觀以嶄新的詮釋。

另一種對古人價值觀的探討，可以在林慶彰教授所著〈從

詩經看古人的價值觀》一文中得窺。《詩經》由《風》、《雅》、《頌》三部分組成，按照林慶彰先生的看法，認為《風》、《雅》、《頌》依時代排列，最早出現的應該是《周頌》，是西周初至西周中葉的作品；其次是《大雅》，是西周中葉至西周末年的作品；《小雅》則是西周末年到東周初年的作品；最後《國風》則是作於東周初到春秋中葉。而作者認為，每一類的詩歌正好反映了該時代周人的價值觀及其演變。

例如在《周頌》的樂歌裡，周人敬畏上天，崇拜祖先，上天的意旨和祖先的教訓是周人崇奉的最高價值，此時人、天、祖先的關係最為密切。到了《大雅》時期，天的權威開始受到懷疑，但人們對天仍懷有一種敬畏的心情。至於《小雅》，由於當時天災人禍不斷，人們懷疑天，咒罵天，而逐漸轉往人事問題的思考，追求公平和正義的價值。至於《國風》則是東周動亂時代的產物，權威統治失控，社會朝向多元發展，公平和正義的價值仍受重視，對於生命的價值和男女的情感也有更深的體會。本文指出古代中國人價值解放的逐步歷程。

第三篇文章是香港學者陳永明所撰〈陶淵明的自然論〉。此一論文之所以選魏晉南北朝時期作為其探討的對象，主要是因為魏晉南北朝是在中國文化史中個人自我發現的時代。而所謂的「自然」並不是大自然之意，而是以「自」為自我，「然」則是以為然，肯定之意，作者將自然解釋為「對自我的肯定」，也就是自我意識的抬頭。換言之，陳教授將自然論解釋為是個人意識的興起，並且以陶淵明為例，來說明陶淵明的自然思想，指出其對「自然」一詞的用語，並不是指大自然，其自然哲學實際上是一種人生哲學。這種人生哲學的重點在於：「樂天委分」、「即事多欣」，一方面順從天命，另一方面亦積極的把一切

發生的事情都當作是可喜的，所以並非完全是一種消極的人生觀。他認為陶淵明的自然哲學，主要就是由「委分」和「即事」兩個觀念的結合，作為魏晉思想對於個人價值的了解。

第二部份的論文主要是針對中國傳統價值觀當中涉及人性與自然兩個重要概念加以探討。共收羅了池田知久教授〈中國思想史中的自然觀念〉，劉思量教授〈社會人與自然人之爭——孔子與老子藝術觀之比較〉，傅佩榮教授〈人性向善論的理據與效應〉，與張亨教授〈天人合一觀的原始及其轉化〉等四篇。

首先，日本東京大學池田知久教授所作〈中國思想史中的自然觀念〉，將道家所興起的自然觀念，視為是對於既存人倫價值的批判。該文指出，人最基本的價值是人體器官對事物感到「爽快」，並進一步加以追求，此為感情和慾望的作用。而儒家則在感情、慾望這些基本的基礎上，又增加道德性，政治性的價值，透過人的精神啟動悟性，判斷事物的善與正，這就是池田教授所謂的「人倫價值」，並特別取荀況的「偽」的概念加以證成。

而道家的興起，則批評此一人倫價值。此種對於「人爲」的批評，在主觀上道家提出「無爲」的觀念，在客觀上則提出「自然」的觀念。池田教授認為，所謂「自然」亦指萬物由於其內涵的動力，自己存在和自己運動的自律性。他認為是戰國末期的道家最先使用此一意義的自然，例如老子說「百姓皆謂我自然」。池田教授並且指出，如果主體採取無爲的態度，結果客體就會成為自然。另外他並進一步討論在《莊子》、《淮南子》、王充《論衡》當中的自然概念，甚至魏晉玄學中的自然觀皆加以簡單的論述，有一些觀念史的意味。

第二部份的第二篇文章是劉思量教授所作〈社會人與自然

人之爭——孔子與老子藝術觀之比較》。主要是從春秋、戰國時代的政治環境、社會狀況，分析比較儒、道二家興起的背景，並從美學理論的觀點，探討儒、道思想對於藝術作品以及中國人的審美思想的影響，加以比較分析。

儒家所採取的途徑是從社會的角度出發，以仁義界定上下尊卑的倫理關係，以天人合一為最高境界。而在美學理論上，將藝術視為人格修養的一部分，因而很少有純粹藝術作品的出現。至於道家，則是更接近自然人的理念，以人生觀統攝宇宙觀、藝術觀，歸結為宇宙人生最高原則的達致。換言之，道家的學說基本上是以人生的藝術、或藝術的人生來看待整個宇宙、生命和生活，劉教授認為道家學說可以說是一種藝術的哲學。

劉教授並進一步討論儒家和道家的藝術理論，指出其共通點和差異點。其共通點如：在藝術之上皆肯定有更高遠的人生目標和理想，如孔子的「仁」和老子的「道」；而且兩家對於藝術與人生的看法都影響中國後代藝術的認知表現方式。至於差異，則在於儒家對社會人的培養以六藝為基礎；而道家自然人的修為則以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為依據。為學日益、為道日損，走反樸歸真的道路。孔子的藝術觀以社會、道德為主導；老子的藝術觀則是一種宇宙觀或本體論的藝術觀。

其次，傅佩榮教授的文章〈人性向善論的理據與效應〉，則以儒家的原典為依據，說明人性向善論才是儒家的原意，也才能開展出一套體系完整、架構分明的倫理學，甚至進而發展至政治、社會、教育、宗教等各方面的應用。

傅教授的論文主要是針對人性向善論的理據、開展和效應

三點來加以發揮。就其理據而言，首就《論語》、《孟子》、《易傳》、《中庸》等經典，指出過去主張人性本善論的難題，並且證明其實質應為向善論。並且將「向」兼指人的自由能力與心的自然傾向的狀態；而以「善」指稱人與人之間適當關係的圓滿實現。其次就其開展而言，傅教授指出，如果人性是向善的，則進一步言人生的道路就是在擇善固執。而就效應而言，若主張人性向善，則就個人而言，人必須在人際脈絡中實現內心自然的要求，而不能離群索居；就社會而言，則由家庭擴張到國家，到人類全體，都可謂向善論的擴充。

張亨教授的〈天人合一觀的原始及其轉化〉一文，則認為天人合一是深植於中國傳統的最主要價值觀之一，即使現代人有些可能不再信持這種價值觀，但仍然將之視為是中國文化的一大特色。文中認為天人合一可以指天與人的關係，也可以指一種精神修養的境界，但他主要是從天與人的關係的角度來加以探討，指出在原始的宗教當中，由中國古代神話，早期文獻和考古資料所顯示的，可以發現在中國原始宗教中，人與天可以透過「靈山」、「建木」等交通升降，或是通過占卜乃至靈異的動物與天相溝通，直到「重」、「黎」、「絕地天通」之後，只有受命的帝王才有「賓天」、「陡降」和「在帝左右」的資格，不過人與天並不是絕然隔離的。

這種天、人的關係，經過儒家的轉換，孔子主張下學上達，孟子主張盡心知性以至於天，《中庸》則主張人可贊天地之化育，乃至宋明儒主張仁者與天地萬物為一體，將道德與宗教融而為一，事實上都是從內在的角度來詮釋天人合一。至於道家，則從原始宗教和神話裡面，轉出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的「天與人不相勝」的境界，成為藝術、美學的泉源。文中亦

涉及到其後荀子天人分離的問題，以及漢儒所謂天人相應的問題，其主要的論點是認為，中國古代天人合一的觀念，逐漸由超越的天變成內在於人的道德本體，因而淡化了人對宗教的信仰。

第三部份是有關中國人的價值之現代重建的問題，共收錄有劉述先教授〈論中國人的價值觀在現代的重建〉、蔣年豐副教授〈憂患意識與天之明命〉與我本人的〈義利再辨——價值層級的現代詮釋〉等三篇文章。

首先，劉述先教授所撰的〈論中國人的價值觀在現代的重建〉指出：中國傳統價值觀的優點，在於存在和價值並不分割，價值與自然也無分裂，而來世與現世亦未割裂為二，同時一元與多元相通，所以這種價值體系有它圓融之處，不會造成分崩離析的困境。然而在面對西方文化挑戰之後，中國人具有上述優點的價值觀，即顯示其無法解決現實問題的難題。

前此，在面對西方文化的挑戰上，國人在理論方面曾經有過不少綜合性的嘗試，劉教授在文中特別舉牟宗三先生為例。牟宗三一方面綜合康德哲學窮智見德的優點，同時又以儒、釋、道智的直覺加以彌補，是當代中國哲學一種十分典型的綜合方向。此一綜合方向走的是反省的道路，追求存在與價值的根源。然而劉教授指出：反省的路子固然可貴，但中國當前的問題在於如何面對現實的挑戰，因此必須另走一條實用的道路，尋求價值和理想的落實，以補反省路徑之不足。

劉教授認為，若要面對現實的挑戰，首先除了強調人的可完善性之外，必須承認人的可完善性本身的限制和天、人的差距；其次則需強調良知的發用，如王陽明所謂「良知不用見聞而有，亦不滯於見聞」的勝義，將良知的發用含括到科學、民

主上。劉教授並提出「理一分殊」的觀念，用以解決不同體系價值觀的衝突，中西價值觀的衝突、以及傳統與現代價值觀的衝突，可謂十分具有建設性的一個觀念。

其次，是東海蔣年豐副教授所提的〈憂患意識與天之明命〉。主要是從當代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的現象學來講中國儒家的一些觀念，該論文認為海德格的「憂懼結構」(care structure)可以用來解析儒家思想當中所強調的「憂患意識」；而海德格思想中所提到的「時間結構」(temporality structure)，則可以用來解釋儒家思想當中的「天之明命」。蔣教授認為，在《書經》和《詩經》雅、頌當中充滿了憂患意識，其中天命對為政者是「匪忱」，不可信賴，但又認為人道德的光明可以開顯天命的意識，而這一點在孔子之後的儒家加以繼續拓深，因此在《大學》中可以看到「以明德明命」，在《中庸》中可看到「心性之誠即是天命之明」，在《易傳》中更強調「以易簡之心感通天地之道」的意旨。這篇文章可以說是以當代西洋哲學相關概念重構儒家價值之作。

最後是我本人的文章〈義利再辨——價值層級的現代詮釋〉。主要是藉著對於孟子「義利之辨」的重新詮釋作為線索，來探尋一個既能合乎傳統中華文化精神，而且能夠針對現代心靈需求的價值觀，勾勒出一個足以兼顧人格發展和公共政策的價值層級體系，並且賦予它以哲學上的理據。此一文章是本人過去所作對臺灣地區價值觀研究的延續。我在前一研究中特別指出：對於價值觀的探討雖有實證調查的必要，但不能僅限於實證研究，因為價值觀包含了個人和羣體的主觀信念與目標，有其實然，現實的成份，因而可以用實證的方法加以探討；但亦包含應然和理想的成份，因此必須針對價值層級進行觀念的